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
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
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0

ISBN 7-5073-0223-7

I. 毛… II. 毛… III. 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集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1518 号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下)

编 者/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责任编辑/谭德山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地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燕华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19. 25 印张 48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5073-0223-7/A · 46 定价：100.00 元(套)

目 录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构想	金冲及 (1)
强国富民道路的开拓与发展	
——学习毛泽东经济思想	刘国光 (21)
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思路	钟哲明 (46)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与不足	
.....	宗 寒 (65)
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	王廷科 (89)
我国建立公有制经济的回顾与思考	何敏智 (108)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索	
.....	栾雪飞 田克勤 (123)
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农业就是工业”	马来山 (140)
论毛泽东重视和发展农业的思想	黎青平 (154)
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	张 毅 (172)
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轨迹的分析	
.....	王 煜 周晓英 (189)
毛泽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战略思想为上海	
经济建设赢得了一次历史机遇	张文清 严爱云 (209)
毛泽东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思路的比较 ...	黄 峥 (223)
毛泽东五十年代在天津调查研究	

的实践与思想	陈向东 (237)
毛泽东与三峡论证	萧木华 (254)
毛泽东的发展观	景体华 (275)
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观	王彦 (294)
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在	
新时期的发展	庞永洁 扈华林 (315)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及其在	
新时期的创造性发展	包心鉴 (333)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恩列斯毛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	
的探索	祝福恩 (352)
从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	
“改革动力论”	徐必珍 刘怀玉 (365)
毛泽东国力思想与当代综合国力研究	张伯里 (377)
试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江虹 (394)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探析	梁柱 (409)
两代伟人投向世界的目光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	潘治富 (427)
邓小平论毛泽东	龚育之 (447)
论邓小平正确领导评价毛泽东及其重大意义	
.....	李复民 李敦送 (460)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	逢先知 (477)
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	石仲泉 (498)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梁锦伟 (518)
简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对毛泽东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	何莲女 姚康乐 (532)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理论	
地位和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赵绍敏 (549)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形成和	
发展的理论思考	陈文坚 徐文学 (562)
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张式谷 (582)
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蔡金发 (598)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 新中国的构想

金 冲 及

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领导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人们不难从事实中清楚地判明：他是不是具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是不是能迅速地对他所面对的复杂局势进行正确的估量，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抓住关键，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诞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刻之一。它的形成过程和俄国十月革命有着明显的不同：是依靠人民军队，先在一块块解放区内建立政权，积累起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初步经验，培育出一批管理人才，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把新中国的诞生简单地看成只是把一块块解放区政权连成一片。事实上，从原来那种分散的、没有中央政府的、主要在农村的政权，到建立起全国性的新政权，并经过通盘筹划，把新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原则等基本格局确定下来，这是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革命的胜利来得那么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没有留下充裕的时间给中国共产党人从容地去作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夜那些日子里，整个局势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向前猛进，纷至沓来的无数难题需要立刻作出处理，战略决战、土地改革、接管新区

等极端繁重的任务不能不占用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精力。要在如此忙碌而紧迫的状况下有条不紊地把一切处理好，在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准备，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越是在这样不寻常的时刻，对毛泽东说来，似乎倒使他那过人的才智发挥得比平时更加充分，更加得心应手，带领全党和人民群众创造出一个个个人间奇迹。

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开始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只是个美好的前景，难以在近期实现。把建立新中国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着手准备，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民革命力量能在总体上取得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全国大多数人的普遍要求。准确地把握火候，要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

当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以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立刻被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10月8日，他起草的给山东兵团的电报中说：“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①他从这个变化中，又从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广大中间群众政治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极端重要的结论。两天后，由他改定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中，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②。

这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会议。“中国人民

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是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开宗明义作出的断语。他在会议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作出这个断语的根据：“二十年来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从这个判断出发，这次会议的报告（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纲领。毛泽东在会议结论里说：“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

历史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并不是谁都能很快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实质的。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还没有进行，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暂时还大于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却从全国人心向背、军事形势发展和国民党区域经济崩溃状况这三方面的综合分析中敏锐地觉察出：国共双方谁占优势的问题已经解决，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了。从这时起，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对新中国的构想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思考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已经从原则上得到解决。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发展了的客观形势，又作出新的概括。它写道：“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它所提到的这个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报告中又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第一，这种垄断资本是在近 20 年间加速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最高峰。它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人们对它又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毛泽东在第二年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区别，当时还没有在我们脑子里明朗。第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是合作的。就是到解放战争初期，尽管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但在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前，也不宜把没收官僚资本列入革命纲领。到十二月会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成熟了。

没收官僚资本，是一项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大政策。这个官僚资本已集中价值达 100 亿至 200 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把它收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便使国家经济在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立刻成为“领导的成分”，能够有力地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0 多年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

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些话，把这项新政策的重大战略意义说得很清楚了。

到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经想得更深更远。他不仅考虑到新中国诞生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怎样的，而且更多地考虑到新中国的未来，考虑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者的关系。在未来，要在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共产党人历来明白宣告的奋斗目标。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既然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回答说：“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③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是刘少奇在会上提出来的。他先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的几个部分，接着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④

毛泽东这时插了一些话，意思是：在现阶段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有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⑤。这就把问题说得更完整了。在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

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⑥显然，毛泽东谈这个问题，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来着眼的，是从中国国内社会关系这个层面来分析矛盾的。这是他在几年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当时，他把这个过渡时期的时间估计得比较长，还要一二十年，后来却把这个看法改变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是什么，实际上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也是党制定对各种经济成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具体依据。这个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也进行过讨论。但为了慎重，会议没有立刻对它作出结论。毛泽东在总结时说：“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⑦会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张闻天起草的一个报告送给中央。当时，东北解放区内有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城市工作的实际经验比其他解放区要多。他们这个报告中说：“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⑧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并经刘少奇、毛泽东修改后加以肯定。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五种成分所构成这个分析就肯定了下来。

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是领导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又有其他多种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利于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富有创造性的大胆构想，是一项重大决策，也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一个富裕强盛国家的必由之路。

可以这样说，对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九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已大体上得到解决。1949年1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已显得成竹在胸。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经建方针，九月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上对的，与九月讨论的相符。”^⑨这些基本方针，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更加完备的表述得到通过；而在建国前夜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过充分协商并丰富补充后，用《共同纲领》这种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终于形成一幅新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完整的蓝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审慎探讨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仓促提出的。

三、对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思考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是指国家体制，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是“联合战线”，但当时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⑩。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很复杂，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写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

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立了“三三制”的政权。因为这些根据地几乎都在农村，“三三制”所包括的除工农外主要是开明绅士，也就是一些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地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关系重新破裂。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曾考虑重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他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⑪但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他们政治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充分注意到的，主张应该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工作^⑫。

“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词，最早可能出现在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对人民民主专政作出明确而完整的阐述并确定下来的，是毛泽东。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⑬这个报告是在党内讲的。同年年底，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便向全国人民公开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⑭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⑮这就用明确而概括的语言把新中国的国体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独创出来的东西。它极有利于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而把必须实行专政的对象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并且正确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这个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那样地广泛，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因而它的巩固和稳定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和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关于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完整了。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指导原则，在以后不曾有过改变。

但如何在中国国土上建立起这种政权构成形式，在实践中仍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就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块根据地到大片解放区，由局部政权到全国政权，并适应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究竟以什么形式为好，这不仅要考虑到专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有利于加强人民政权同群众的联系，发扬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确定，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体现了新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级代表大会来行使这种权力；又保证国家机关能迅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各项工作，不致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这里要特别提到，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试验失败的教训，在九月会议上肯定地说：“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就必须当议事日程来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规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⑩这是中国人民从自己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它在新中国诞生一年前就决定下来了。但在这以后，仍有极少数对中国实际国情懵然无知而只醉心于照搬某些外国模式的人，反对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主张搞西方式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此时此刻，重温一下40多年前毛泽东说过的这段话，确实使人感到更有兴味。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0多个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在民族问题上经过长时间发展所形成的重要特点。在建党初期到30年代中期，由于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实行民族自决、由各民族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但随着对中国实际国情了解的加深，这个看法逐渐改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41年5月，由毛泽东主要起草并定稿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⑪。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写道：“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⑫新中国诞生前夜，周恩来向前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作报告，特别提到：“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他详细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后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

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⑨在政协所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了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成功创造。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历史进程的推演，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四、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城市和乡村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基本格局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决不是依靠小生产所能建设起来的，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生产。旧中国的工业很不发达，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内。新中国的根本任务既然将由革命转入建设，自然就要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走过一条迂回的道路：它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诞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党的工作重心只能转入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乡村中去，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又只能是暂时的。

毛泽东看得很远。他认定新中国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就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并且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又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⑩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根据当时准备对日本大举反攻的形势，他又多次说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